

就业质量对城镇居民失业率的影响*

张 顺 郭娟娟

【摘 要】文章使用中国 2008~2019 年省级面板数据,在界定就业质量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就业质量对城镇居民失业率的影响。就业质量为区域经济社会制度所建构,可以从就业环境、劳动者报酬、社会保障、劳动关系 4 个维度综合衡量,能够极大影响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意愿与流动频率,进而影响区域宏观失业率。实证分析发现,提升就业质量能够有效减少区域摩擦性失业,还可以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扩大就业需求,从而有助于降低城镇居民失业率,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分位数回归显示,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中等分位点有较强的降低作用,在低、高分位点作用相对较弱,其作用强度随分位值上升呈倒 U 形特征。同时,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就业质量的失业率效应有显著调节作用,在互联网发展较迟缓的地区,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作用更强。文章认为,深化经济社会体制综合改革,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可以有效降低地区失业率,从而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全面发展。

【关键词】就业质量 失业率 互联网发展

【作 者】张 顺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郭娟娟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一、引 言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经济模式快速转型,就业需求结构快速变化,劳动者转岗频率加快,失业风险剧增。加上每年大学生就业数量逐年攀升,预计 2022 年超千万。因此,新形势下失业率有较大的上升压力,使实现更充分就业成为重要的政策议题与学术问题。失业率作为充分就业的重要衡量指标,其变化规律与影响因素一直是劳动经济学的经典研究问题。失业率包括周期性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率又由结构性失业率与摩擦性失业率构成(蔡昉, 2016)。关于失业率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有以下观点:(1)需求不足论。需求不足论认为,有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我国面临的主要就业风险及多维治理研究”(编号: 21&ZD181)的阶段性成果。

效需求不足使社会资源无法充分利用,进而导致“非自愿失业”,通过政府投资扩大有效需求,是降低失业率的有效手段。(2)经济增长论。奥肯定律指出,国家或地区的 GDP 水平上升,就业率增加,失业率下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是降低失业率的基本策略,但经济增长对失业率的影响程度受就业弹性制约(夏炎等,2018)。(3)结构决定论。由于经济结构变化引发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之间的持续性地在空间和能力上的不匹配与不平衡,导致失业和空岗同时存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结构转型使许多岗位被机器替代,同时也创造了更多新的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机会(王阳,2020),但由于失业者无法适应新岗位,导致结构性失业持续存在。(4)工作搜寻—匹配论。工作搜寻—匹配理论认为,通过降低劳动者工作搜寻—匹配成本,可以有效减少摩擦性失业并降低失业率(Diamond, 1971; Mortensen, 1970; Pissarides, 1974)。互联网信息平台能大幅降低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的搜寻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从而有效降低失业率(王阳,2020)。上述观点的差异在于,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主要影响周期性失业率的变化,经济结构转型则引发结构性失业率变动,这三者主要属于宏观经济因素对失业率的短期影响,但工作搜寻—匹配分析着眼于微观搜寻—匹配机制对失业率的影响研究,探讨微观个体摩擦性失业与总体失业率的中长期联结机制。

本文试图从经济社会制度变革层面寻求减少摩擦性失业进而降低总体失业率的作用机制,探讨失业问题的长期治理之道。作为经济社会制度因素所建构的就业质量,不但事关企事业单位用人成本与用人需求,也会改变劳动者的工作流动的意愿与行为,从而对总体失业率产生影响。但这一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均较为缺乏。因此,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就业质量如何影响城镇居民失业率?数字经济转型下互联网发展对二者产生怎样的调节作用?

二、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失业率的理论分析

就业质量源于国际劳工组织在 1999 年提出的“体面劳动”概念,此后,欧盟提出 Laeken 指数、欧洲工会提出欧洲就业质量指数(EJQI)衡量“体面劳动”,该指数主要从工作特征和劳动力市场特征两个维度建构就业质量指数,综合衡量劳动者就业的经济与非经济福祉,体现“体面劳动”的实质内涵。从具体研究看,就业质量有宏观、微观之分,前者指国家或地区层面整体性的经济与非经济福祉,后者指个体层面的经济与非经济福祉。本文在省域层次讨论就业质量,用此概念衡量省域劳动者就业总体福祉水平。刘素华(2005)认为,就业质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获取报酬优劣程度的综合性范畴,就业质量应该包含工作性质、聘用条件、工作环境、社会保障和劳动关系。赖德胜等(2011)提出就业质量应包括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状况、劳动者报酬、社会保护和劳动关系 6 个维度的指标;张抗私、李善乐(2015)提出包括就业状况、劳动报酬、劳动关

系、就业能力、就业环境在内的 5 个维度的指标。这些研究的目的更多是评估地区整体就业质量优劣,就业质量测量的指标选择较为宽泛,有些研究甚至将失业率也纳入其中,混淆了充分就业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边界。本文认为,就业质量是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经济社会的制度性因素在劳动者经济与非经济福祉方面的综合体现,可以从就业环境、劳动者报酬、社会保障水平和劳动关系 4 个维度综合衡量就业质量。

那么,就业质量是否且如何影响地区失业率?现有研究并未回答此问题。从理论上分析,省域就业质量主要通过影响地区摩擦性失业水平,进而改变总体失业率水平,且这种影响存在直接与间接两条途径。首先,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直接影响。在同等条件下,劳动者个体工作搜寻—匹配的频率减少、效率提高,失业人数就会减少,宏观层面的失业率就会降低。就业质量可以通过改变劳动者的工作搜寻的频率与效率,进而直接影响失业率。(1)劳动者工作稳定性影响工作搜寻频率。劳动者工作搜寻频率主要受劳动者就业环境、工资、社保等就业质量因素的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越高,就业岗位的经济与非经济条件越好,工作流动性就会相对越低,搜寻者数量及其搜寻频率将会下降,总体上失业者减少,失业率自然会有所下降。(2)用人单位劳动力成本影响工作搜寻效率。劳动者就业质量较高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往往会增加用人单位的负担,使用人单位劳动需求减少,同时也会导致求职者搜寻—匹配难度增加,匹配效率下降,使失业率又有上升压力。因此,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直接影响取决于上述两种力量的相对强度。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时代的到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劳动者更加追求“体面工作”,对就业质量有更高的期望。各级政府在经济社会政策领域对劳动者就业环境、就业时间、就业保障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蔡昉,2021),全方位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承担了更多的劳动力成本,多方面减轻企业负担,回应劳动者体面工作的新要求。企业等用人单位也将顺应时代发展,在尽量不减少用工需求下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使就业质量能够直接有效降低失业率。其次,就业质量对失业率还存在间接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越高,劳动生产率上升,推动经济发展与需求增长,进而通过扩大就业需求,增加就业人数,能够有效缓冲就业质量上升引发的用人成本升高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强化就业质量降低失业率的主效应。因此,就业质量是有效降低地区失业率的整体性、长期性的制度因素。

现有关于就业质量与失业率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具体单一指标衡量就业质量,并检验这些指标对失业率的影响。(1)收入差异、工资水平等经济指标对就业或失业率的影响。王巍等(2015)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发现西部省域内收入差异与就业显著负相关,但东部与中部呈正相关;张兵(2007)利用国家层面统计数据发现收入差距与失业率呈正向关系;蒋文莉、刘日星(2015)运用国家层面数据发现工资与失业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些研究结果显示,地区收入差距越低,地区失业率更可能较低,

但工资水平对失业影响不显著。(2)社会保障因素对失业率的影响。这类研究的结论不一致,有降低与升高两种结论。其中,降低论者发现社会保障因素促进就业并降低失业率。郑功成(2008)通过分析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的协调发展关系,认为二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刘新、刘星(2010)运用199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发现社会保障支出虽然与就业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是就业量的格兰杰原因;侯明等(2020)用2008~2017年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各省社会保障与就业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升高论者发现社会保障因素抑制就业数量或提升失业率。林治芬(2005)通过国家层面1989~2003年统计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社会保障政策加剧失业;徐晓莉等(2012)基于全国1989~2009年数据实证分析,认为失业保险支出的增加会导致城镇失业率的增加。但这些升高论者研究都是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初期或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社会保障制度刚刚起步,失业更多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所致,并非失业保险增加导致城镇失业率上升,而是城镇失业率上升导致失业保险支出增加。同时,由于上述研究数据较为陈旧,所得结论具有较大的局限。二是用综合性指标衡量就业质量,并探讨就业质量与就业或失业率关系的实证研究。这方面实证研究仅有谭永生(2020)利用统计数据从总体上同时估算了中国就业质量与充分就业状况,并发现两者有共同的变动趋势,但未进行深入的定量分析。同时,虽然现有多数实证研究发现就业质量某些维度指标与失业率负相关,但结果并不一致。其原因主要是用某些单一指标衡量就业质量,理论基础相对不足。其中部分研究使用全国总体数据,但没有控制省域之间的巨大异质性,也会极大影响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定性。基于此,本文使用中国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就业质量对城镇居民失业率的影响。

三、变量测量及实证分析方法

(一) 数据来源

为了在控制地区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影响,本文以全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包括:(1)从《中国统计年鉴》获取全国31个省份2008~201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比、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年末人口数、外地人口数与本地人口数、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等数据。(2)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中获取各省2008~2019年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占比和就业质量等相关指标。其中部分变量可以直接获取,另一些变量需要通过计算获得。本文采用均值填补法对个别缺失值进行处理,使本研究分析数据成为省级平衡面板数据。

(二)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城镇居民失业率。现有研究多使用“就业人数”衡量劳动就业的“量”的

特征,但就业人数是“量”的绝对值测量,仅反映当前劳动力需求情况,没有全面反映劳动力“量”的供需特征。失业率指标即失业者在劳动者中所占比重,是“量”的相对值测量,可以从供求两个方面刻画劳动力就业的充分程度。故使用各省城镇登记失业率衡量城镇居民失业率。

2. 自变量:就业质量。本文参考赖德胜等(2011)、苏丽锋(2013)的研究,指标选取更加侧重劳动者劳动保护、劳工关系等非经济性指标,对部分指标进行取舍和修改,建立以就业环境、劳动者报酬、社会保障和劳工关系4个维度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其中,就业环境一级指标包括行业工资收入差异、职业病及工伤死亡发生率、所有制工资收入差异、人均教育经费支出4个二级指标;劳动者报酬一级指标包括平均工资、工资增长率、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建筑业与制造业的平均劳动报酬4个二级指标;社会保障一级指标包括人均财政社保支出比例、平均社保参与率、享受生育与工伤及失业保险待遇者的比例3个二级指标;劳动关系一级指标包括工会参与率、劳动争议结案率、工会调解效率3个二级指标。上述二级指标中,行业工资收入差异、职业病及工伤死亡发生率、所有制工资收入差异为负向指标,其余为正向指标。本文用14个二级指标合成就业质量综合得分,这实际上是由多维度指标到综合性单一指标的处理过程。为了使各指标之间的权重相对客观并使各年度数据可比较,借鉴苏丽锋(2013)的研究,选择算数平均加权法作为就业质量综合得分的合成方法。

3. 调节变量:互联网发展。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采用各省互联网宽带端口接入率衡量(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div 年末人口数)该区域互联网使用程度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

4. 控制变量:分别用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占比及其他结构性变量控制周期性、结构性失业影响因素。(1)经济增长率。本文参考就业弹性的计算指标,选取经济增长率衡量该地区经济发展,以控制经济增长对失业率的影响。(2)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使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地区GDP的比重衡量地区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既会对就业水平产生直接影响,也能通过拉动居民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间接影响就业水平(贾敬全、宋晨泽,2021)。(3)流动人口比例。用外地人口与本省人口之比表示,控制流动人口对失业率的影响(马忠东、王建平,2011)。(4)第三产业劳动者占比。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的持续上升意味着就业规模的扩张,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最强且与就业呈现正相关(李贵赏,2020),用此变量控制经济结构对失业率的影响。(5)低教育程度劳动者占比例。本文将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归为低教育程度劳动者,计算出低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比例,以控制人力资本结构对区域劳动就业的影响。(6)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已有研究指出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与失业率显著负相关(苏春红等,2015)。以此变量控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失业率的影响。

（三）就业质量计算方法

就业质量为综合性测量指标,为了使就业质量具有跨年度与跨地区的可比性,本文设定 2008 年为基期年份,并以 2008 年各单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1 和 0,然后根据基期年份的数据计算之后各地区各年的就业质量指标(苏丽锋,2013)。具体分以下三步。

第一,为了保证指标得分的跨地区可比性,采用线性功效函数计算 2008 年的各指标标准化得分:

$$Score_i=(X_i-X_{min})/(X_{max}-X_{min}) \tag{1}$$

$$Score_i=(X_{max}-X_i)/(X_{max}-X_{min}) \tag{2}$$

其中, $Score_i$ 表示第 i 个指标的得分,取值在 0~1 之间, X_i 表示 2008 年第 i 个指标的原始值, X_{max} 表示在 2008 年该指标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的最大值, X_{min} 表示 2008 年该指标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的最小值。正向指标用式(1)计算,负向指标用式(2)计算。然后将上式所得结果标准化,各指标与就业质量正相关。

第二,为了使就业质量各年份之间具有可比性,对后续年份的指标采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Score_{i(t)}=(X_{i(t)}-X_{min(2008)})/(X_{max(2008)}-X_{min(2008)}) \tag{3}$$

$$Score_{i(t)}=(X_{max(2008)}-X_{i(t)})/(X_{max(2008)}-X_{min(2008)}) \tag{4}$$

其中, t 表示当前期年份, $Score_{i(t)}$ 表示 t 年 i 指标的得分, $X_{i(t)}$ 表示 t 年 i 指标的实际值,最大值和最小值仍使用 2008 年的数据。式(3)、式(4)分别用于计算正向、负向指标。

第三,在得到每年标准化得分之后,采用算术平均加权法将 14 个指标加权合成“就业质量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Index=\sum_{i=1}^{14}(weight_i \times score_i)$$

其中, $Index$ 表示所在地区的就业质量得分, $weight_i$ 为所在地区 i 指标权重, $score_i$ 为所在地区 i 指标标准化得分。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就业质量与失业率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用就业质量计算方法得到各省 2008~2019 年就业质量指数,失业率选取 2008~2019 年各省城镇登记失业率。图以 2008 年的数值为基期,显示了中国 2008~2019 年就业质量、失业率和互联网发展水平 3 个变量随时间的变动趋势。图显示,失业率变动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就业质量呈逐年缓慢上升趋势,同时互联网发展水平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可以预期,失业率与就业质量、互联网发展可能存在负向关联,但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及其动态模型分析方法

进行检验。

表 1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中国 2008~2019 年各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均值为 0.034,最小值 0.012,最大值 0.046,最大值为最小值的近 4 倍;就业质量指数全国均值为 0.707,最大值为 1.64,最小值为 0.376,最大值超过最小值的 4 倍;互联网发展程度全国均值为 0.34,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30 多倍,表明就业质量、失业率与互联网发展均存在较大时空差异,蕴藏着丰富的信息量。其他控制变量在地区、年份之间也有较大的异质性,显示 2008~2019 年中国省际、不同年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or 波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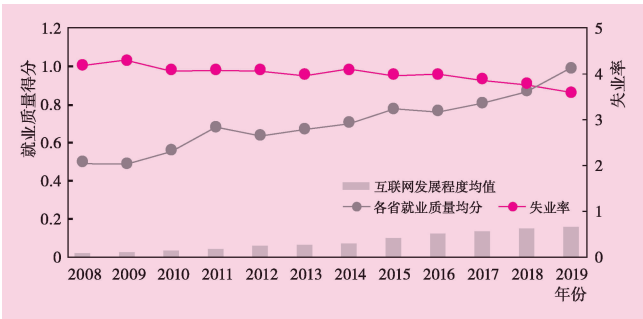


图 2008~2019 年互联网普及率、就业质量和失业率变动趋势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N=372)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失业率	0.034	0.007	0.012	0.046
就业质量	0.707	0.195	0.376	1.640
流动人口比例	0.272	0.282	0.001	1.846
第三产业人口比重	0.340	0.171	0.002	0.831
GDP 增长率	0.118	0.076	-0.250	0.299
低教育程度者占比	0.837	0.999	0.378	0.998
互联网发展程度	0.340	0.229	0.035	1.074
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0.113	0.032	0.057	0.245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0.735	0.036	0.658	0.838

(二) 就业质量影响失业率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影响,并探讨互联网发展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面板数据分析包括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相对更有效但是要求自变量和个体效应不相关,而固定效应虽没有这样的要求,但在模型估计过程中会损失更多的自由度(王芳、周兴,2012)。根据豪斯曼(Hausman)检验结果,本面板数据更适合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表 2 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模型 1 是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就业质量影响失业率的回归模型,模型 2 是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 3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控制了互联网发展水平。模型 4 同时进入模型 2、模型 3 的所有自变量与控制变量。模型 1 至模型 4 均显示,就业质量和失业率显著负相关。比较模型 1 和模型 2,就业质量系数由 0.013 降至 0.008,随着控制变量增加,虽然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影响明显下降,但显著性不变。比较模型 1 和模型 3,就业质量系数由 0.013 降至 0.008,下降幅度与模型 2 相对模型 1 就业质量回归系数一致,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失业率有较大的影响。这说明,当就业质量升高时,失业率会显著下降,就业质量和失业率之间负相关。

模型 5 在模型 4 的基础上加入就业质量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后包括主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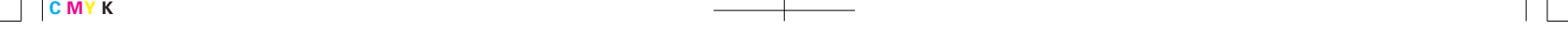


表 2 就业质量影响失业率的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N=372)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就业质量	-0.013*** (0.001)	-0.008*** (0.002)	-0.008*** (0.002)	-0.005*** (0.002)	-0.007*** (0.002)
第三产业就业者比重		0.004** (0.002)		0.005*** (0.002)	0.005*** (0.002)
流动人口比例		-0.004**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GDP 增长率		0.003 (0.002)		0.001 (0.003)	-0.001 (0.003)
低教育劳动者占比		0.009 (0.006)		-0.002 (0.007)	-0.001 (0.007)
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0.020* (0.010)		-0.029*** (0.010)	-0.017 (0.011)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0.007 (0.012)		-0.007 (0.012)	0.001 (0.013)
互联网发展			-0.005*** (0.001)	-0.006*** (0.002)	-0.006*** (0.002)
互联网发展 × 就业质量					0.013*** (0.003)
常数项	0.043*** (0.001)	0.028*** (0.010)	0.041*** (0.001)	0.049*** (0.011)	0.033*** (0.001)
R-sq: within	0.342	0.398	0.369	0.423	0.446
R-sq: between	0.092	0.114	0.134	0.091	0.090
R-sq: overall	0.161	0.191	0.186	0.182	0.189
Prob>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Hausman 检验	Chi2(1)=0.05	Chi2(7)=2.92	Chi2(6)=1.04	Chi2(8)=4.52	Chi2(9)=6.98
Prob>chi2	0.974	0.400	0.792	0.874	0.728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交互效应。模型 5 结果显示,就业质量、互联网发展的主效应分别是 -0.007、-0.006,互联网发展与就业质量的交互效应为 0.013,3 个系数均统计显著。此结果表明,就业质量、互联网发展均能有效降低失业率,且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就业质量的失业率效应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交互项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劳动者就业机会显著增多,就业信息传递效率更高,就业质量降低失业率的效应有所减小。这说明,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就业机会更多,就业信息更为充足,也更为通畅有效,使劳动者工作搜寻成本大幅降低。当劳动者对现有工作不满意而希望获得更高质量就业时,劳动者可以快速在互联网上寻找新的就业信息,以相对较少的搜寻成本得到较高质量的工作,使提升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影响减弱。但在互联网发展较慢的地区,劳动者获取就业信息的途径相对较少,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劳动者难以及时有效获取高质量工作岗位信息,工作搜寻成本相对更高。即使劳动者对现有工作不太满意,但较高的工作搜寻成本会使劳动者尽量减少职业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就业质量有所提高,就会极大提升劳动者继续从事当前工作的可能性,减少流动性并降低失业,使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降低作用增强。

(三) 就业质量影响失业率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就业质量影响失业率及互联网发展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在失业率不同分位点的结构性差异。本文主要选取失业率的 10%、25%、50%、75%和 90%5 个

分位点对表 2 中模型 5 的变量进行分位数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可以看出,就业质量对失业率不同分位点的影响有明显差异,在失业率的中等分位值处(在分位 25%~75%之间),就业质量提升能够显著降低该地区失业率,而在 25%分位以下和 75%分位以上,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影响不显著,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影响随分位值上升呈倒 U 形变化趋势。首先,根据本文前面的理论分析,高分位失业率更多是由于周期性失业而非摩擦性失业所致,但低分位失业率已接近充分就业,降低难度不断增加,导致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高、低分位影响较低。其次,互联网发展对失业率 50%以下分位点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失业率 50%分位以上有显著影响,能够显著降低失业率。也就是在一个地区的失业率处于较低分位点时或失业率水平较低时,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就业信息与就业机会难以继续降低失业率,而对较高失业率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再次,从互联网发展和就业质量的交互效应看,随着失业率分位值的提高,失业更多由周期性与结构性原因所致,互联网发展对失业率的主效应显著,但对就业质量影响失业率的调节效应逐渐减小,在失业率水平处于 90%分位时,互联网发展对就业质量降低失业率的削弱作用不显著。这说明在失业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且互联网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摩擦性失业者更多由职业流动所致,就业质量提升能够更为有效降低工作流动性,并显著减少摩擦性失业,从而对失业率的降低作用更为有效;而在失业率处于较高分位且互联网发展水平也较高时,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者相对较多,就业质量提升对失业率的降低作用相对较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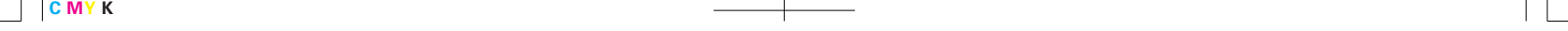
(四) 就业质量影响失业率的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以上计量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必须控制失业率对就业质量的反向因果的影响。本文借鉴王芳、周兴(2012)的研究,使用各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项和滞后二期项的数据来代替当前项进入模型,这种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当期变量与当期残差项相关

表 3 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分析结果(N=372)

变 量	分位点				
	10%	25%	50%	75%	90%
互联网发展	-0.004(0.005)	-0.005(0.004)	-0.006** (0.002)	-0.007** (0.003)	-0.007* (0.004)
就业质量	-0.008(0.006)	-0.008* (0.004)	-0.007** (0.003)	-0.006* (0.003)	-0.005(0.004)
第三产业就业者比重	0.005(0.006)	0.005(0.004)	0.005* (0.003)	0.004(0.003)	0.004(0.004)
GDP 增长率	0.001(0.008)	-0.001(0.005)	-0.001(0.003)	-0.002(0.004)	-0.002(0.006)
流动人口比例	-0.007(0.005)	-0.005(0.004)	-0.003(0.002)	-0.001(0.003)	0.001(0.004)
低教育劳动者占比	0.003(0.022)	0.001(0.016)	-0.001(0.010)	-0.003(0.012)	-0.005(0.016)
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0.030(0.033)	0.010(0.024)	-0.020(0.015)	-0.043** (0.018)	-0.062** (0.025)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0.040(0.041)	0.022(0.029)	-0.003(0.019)	-0.023(0.022)	-0.039(0.030)
互联网发展×就业质量	0.018** (0.009)	0.016** (0.006)	0.012** (0.004)	0.010** (0.005)	0.008(0.007)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对表2模型2、模型4和模型5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项的回归结果

变 量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滞后一期	滞后二期	滞后一期	滞后二期	滞后一期	滞后二期
就业质量	-0.008*** (0.002)	-0.007*** (0.002)	-0.005** (0.002)	-0.005** (0.002)	-0.005*** (0.002)	-0.005** (0.002)
第三产业者比重	0.009*** (0.002)	0.008*** (0.002)	0.010*** (0.002)	0.008*** (0.002)	0.008*** (0.002)	0.007*** (0.002)
流动人口比例	-0.002(0.002)	0.003(0.002)	-0.002(0.002)	0.003*(0.002)	-0.002(0.002)	0.003*(0.002)
GDP 增长率	0.003(0.003)	0.001(0.003)	0.001(0.003)	-0.002(0.003)	-0.002(0.003)	-0.003(0.003)
低教育者占比	0.012** (0.006)	0.020*** (0.006)	0.002(0.007)	0.012*(0.007)	0.004(0.007)	0.014*(0.007)
财政收入占比	-0.013(0.012)	-0.002(0.013)	-0.024** (0.012)	-0.009(0.013)	-0.016(0.012)	-0.004(0.013)
劳动人口占比	0.001(0.013)	-0.001(0.014)	-0.013(0.013)	-0.011(0.015)	-0.004(0.013)	0.002(0.015)
互联网发展			-0.006*** (0.002)	-0.004** (0.002)	-0.005*** (0.002)	-0.004** (0.002)
就业质量×互联网发展					0.014*** (0.004)	0.016*** (0.005)
常数项	0.026** (0.011)	0.018(0.012)	0.046*** (0.012)	0.033** (0.013)	0.030*** (0.001)	0.030*** (0.001)
样本量	341	310	341	310	341	310
R2: within	0.374	0.290	0.396	0.305	0.417	0.330
R2: between	0.101	0.097	0.064	0.061	0.059	0.047
R2: overall	0.170	0.136	0.147	0.113	0.149	0.107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比较表2、表4可以发现,就业质量、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滞后项对失业率的回归系数仅有微小变化,且显著性未变,说明模型2和模型4、模型5的结果稳健。其中模型5、模型10、模型11为包括主效应与交互效应的全模型,比较3个模型中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滞后二期、滞后一期项回归系数0.005小于当期项的回归系数0.007,说明当期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反向因果,这种反向因果夸大了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影响。在控制这一反向因果之后,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影响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显著,说明二者因果关系是稳健的。进一步比较模型5与模型10、模型11中就业质量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发现滞后二期(0.016)和滞后一期(0.014)交互项系数略大于当前期(0.013),显著性水平未变,显示互联网发展对就业质量影响失业率的调节效应具有较好的稳定性,由于当期数据之间存在较强的内生性,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互联网发展对就业质量与失业率的调节效应强度。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建构就业质量综合性测量指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探讨就业质量与失业率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互联网发展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得到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就业质量对失业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就业质量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失业率水平。虽然就业

质量提升或许在局部或短期会增加企业的用工压力,但从长期和全局看,提升就业质量能够降低劳动者工作流动性,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需求,有效降低地区失业率。(2)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影响受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工作搜寻成本较低,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降低作用会有所削弱;但在互联网发展程度比较低的地区,就业质量对失业率的降低作用相对更有效。(3)就业质量更有利于降低中低分位点失业率。这是由于中低分位失业率更多由摩擦性失业所致,而高分位失业率更多因周期性、结构性失业构成,此结论可以进一步支持就业质量更有助于降低摩擦性失业的理论分析。

上述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1)各级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管理者要充分认识就业质量与充分就业的内在因果关系,通过全方位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有效降低地区失业率。本研究说明中国就业质量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并非部分管理者与部分学者担心的那样,即提高就业质量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从而导致失业率增加。就业环境、劳动者报酬、社会保障与劳动关系,这4个方面主要取决于各地政府及各经济主体的经济社会制度与政策,只有持续提高各级政府的现代社会治理水平,降低省域收入不平等程度,完善地区社会保障,建构良好劳动关系,才能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进而达到对城镇居民失业率的长期有效治理。(2)各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应将互联网发展作为基础设施优先发展。互联网发展可以为劳动者拓宽就业信息获取渠道,降低工作搜寻成本,提高人职匹配速度。同时依附于互联网而兴起的新行业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全方位带动各类创业活动,大量增加就业岗位,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可以吸纳大批劳动者,也有助于劳动力市场弱势群体重新就业,进而降低区域失业率。(3)经济发展迟缓地区更要充分重视劳动者就业质量,有效降低或抑制地区失业率上升。经济发展相对较迟缓地区,互联网发展也较为缓慢,再加上工作薪酬较低、社会福利较差等就业质量原因,导致劳动力大量频繁流动与流失,摩擦性失业水平较高。这些地区可能由于经济实力欠缺,难以大幅提高劳动者薪酬水平,但可以尽可能优先增加劳动者非薪酬福利,积极改善劳动者工作环境,优化劳动者职业发展空间,多方位提升劳动者工作满意度,切实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不但可以吸引更多的优质劳动力,还可以有效降低区域内部摩擦性失业,降低地区的失业率水平,从而逐步推进地区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分阶段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 蔡昉(2016):《从总量性矛盾到结构性矛盾——解读中国劳动力市场》,《China Economist》,第1期。
2. 蔡昉(2021):《数字经济时代应高度重视就业政策 如何让新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财经界》,第25期。

3. 侯明等(2020):《地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就业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华东经济管理》,第5期。
4. 蒋文莉、刘日星(2015):《中国工资、经济增长、人口与失业之间动态关系研究》,《财经问题研究》,第3期。
5. 贾敬全、宋晨泽(2021):《财政政策影响就业的机理及实现路径》,《华东经济管理》,第9期。
6. 林治芬(2005):《社会保障政策与就业联动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第6期。
7. 刘素华(2005):《建立我国就业质量量化评价体系的步骤与方法》,《人口与经济》,第6期。
8. 刘新、刘星(2010):《地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基于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经验》,《经济与管理研究》,第10期。
9. 李贵赏(2020):《现代服务业结构变动影响就业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测度》,《商业经济研究》,第19期。
10. 赖德胜等(2011):《中国各地区就业质量测算与评价》,《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1期。
11. 马忠东、王建平(2011):《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失业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12. 苏丽锋(2013):《我国转型期各地就业质量的测算与决定机制研究》,《经济科学》,第4期。
13. 苏春红等(2015):《延迟退休年龄对中国失业率的影响:理论与验证》,《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14. 谭永生(2020):《中国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测度评价与实现路径研究》,《宏观经济研究》,第5期。
15. 王阳(2020):《互联网快速普及对城镇失业的影响及建议》,《宏观经济研究》,第7期。
16. 王巍等(2015):《城镇居民就业、工资与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分析——以面板数据模型为工具》,《中国管理科学》,第S1期。
17. 王芳、周兴(2012):《人口结构、城镇化与碳排放——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18. 徐晓莉等(2012):《我国失业保险支出与城镇失业率关系研究——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人口与经济》,第2期。
19. 夏炎等(2018):《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非农就业影响研究——基于投入占用产出模型》,《中国科学院院刊》,第7期。
20. 郑功成(2008):《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国基本民生问题的政策协调与协同推进》,《中国劳动》,第8期。
21. 张兵(2007):《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失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城市问题》,第2期。
22. 张抗私、李善乐(2015):《我国就业质量评价研究——基于2000~2012年辽宁宏观数据的分析》,《人口与经济》,第6期。
23. Diamond, P.A. (1971), A Model of Price Adjust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3(2):156-168.
24. Mortensen, D.T. (1970), Job Search, the Duration of Unemployment, and the Phillips Curv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5):847-862.
25. Pissarides, C.A. (1974), Risk, Job Searc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6):1255-1267.

(责任编辑:朱 犁)